



现代楚辞批评史

● 黄中模 著

● 湖北教育出版社

现代楚辞批评史

黄中模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襄樊日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1插页 306 000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300

ISBN 7—5354—0510—6/I·22

定价4.65元

序

汤 炳 正

回顾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楚辞》研究史，虽远承前代传统，考证（包括注释文字、校正史迹）与评鹭（包括评价行谊、品第文章）并重，但“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大大超越了前代。这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多，主要表现在质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跟“五四”时期西方的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输入是分不开的；而对唯物史观的掌握与运用，虽还不够熟练，显然已成为《楚辞》研究的动力。因而，无论从考证的精密和评鹭的允当来讲，《楚辞》研究，确实使垂两千年的“显学”，至此而形成了一个历史上突出的高峰。这就是现代《楚辞》研究的主流。

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旋涡。

我们知道，谈到考证，从汉代起，对屈原的事迹即有不同的记载；谈到评鹭，从汉代起，对屈原的行谊已有歧异的见解。但是，根本否定屈原这一历史人物的存在，或贬诬屈原这一文化伟人为“弄臣”等等，则无疑是晚近才出现的新的学术动态。

本来，学术界的辨伪工作，唐宋诸贤已开其先路；清代学者又显其实绩；到了清末维新之际，康有为承经今文学家之余绪，在《新学伪经考》里，把这一工作引向了极端，也走入了歧途，逮至“五四”运动，清算封建文化之风大起，胡适诸人又把辨伪工作推向新的高潮。如果说，廖季平否定屈原之存在，只是晚清以来经今文学派的一个发展，那么，胡适否定屈原的存在，则更带有

“五四”疑古思潮的新特征。至于在评鹭方面，则历史上所谓“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文人轻薄”等等议论，千百年来，早已在《楚辞》研究中销声匿迹。然而，抗战期间又出现了什么“文学弄臣”之类的诡异之谈，这显然跟当时围攻郭老历史剧《屈原》的逆流是相呼应的。以上种种，应当说是屈学主流中的几个旋涡；而这些旋涡，只不过是特定的历史条件所激起的水文现象而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这种不良倾向，二次大战之后，竟流传于日本的学术界。六十年代以来，他们此唱彼和，蔚然成风。但日本的“屈原否定论”者，虽导源于我国，并接受了我国的某些观点，而其所涉及的范围及提出的问题，却又远远超出我国老牌的“否定论”。从某种意义讲，他们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我国学术界参加探讨与辩论。石借他山，互相切磋，这无疑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一次盛举。可见，近几年来评议“屈原否定论”的学术活动之所以蓬勃发展，正是在这一新的学术形势下形成的。它不完全是旧事重提，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从上述的情况看，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领域里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其中激落着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潮，充满了批判精神，是一段具有深邃历史意义的屈学发展历程。因而能为它撰写一部学术史，以纪盛况，明是非，正是屈学界义不容辞的大事。而黄中模君的这部《现代楚辞批评史》的撰写，正是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黄君自幼及青年时代爱读古书，对古代文化有深厚的根柢；而对《楚辞》研究，尤为专长。数年来，刻苦勤奋，锲而不舍，除已出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外，尚有积稿甚多。近年来，在评议国际“屈原否定论”的学术活动中，黄君始终站在论争第一线。其搜集资料之富，撰写文章之多，探讨问题之深且广，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因而，这部《现

代楚辞批评史》由他来写，是最适当不过的。的确，正由于在这场学术活动中，黄君并不是一位旁观的史论家，而是一位参与论争的实践家。这就使得这部论著的内容，多精辟独到之处。它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作，也是一部独抒己见的学术专著。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屈原与楚辞研究工作者，在黄君《现代楚辞批评史》成稿之际，我写下了如上的几点极不成熟的意见，质之方家，以为然否？

1989年8月16日于渊研楼

前 言

伟大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旧的封建文化。在对中国旧文化进行批判、扬弃的同时，也逐步认识到中国旧文化中精华部分必须继承，对于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对于古代文化，决不能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

“五四”以后对于《楚辞》的研究和批评，就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旧文化的上述清醒的认识。

这一时期，由于新科学的传入和提倡，对于《楚辞》的研究和批评，既受到旧的经学的影响，也受到新思潮的催化。各种思想观点，各种研究方法，也凭借着中国古代辉煌的文化艺术，充分进行自我表现。这就构成了现代、当代《楚辞》学的繁荣而又复杂的局面。

对于《楚辞》，如诠释、考证及典故的训解，新的学科，特别是地下出土文物的新成就，使之有了很大的发展。过去许多不懂或不甚了解的问题，有了较为确切的解释。所以70多年来，《楚辞》研究中的对章句的诠释、故实的考据方面的“务实之学”，有了突飞猛进，令人刮目相看。在那一部部璀璨夺目的著作中，姜亮夫先生的《楚辞通故》、汤炳正先生的《屈赋新探》、肖兵的《楚辞与神话》等，便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由于《楚辞》专家们对屈骚认识的深入，给从理论上入手深入研究《楚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自“五四”起至当代，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楚辞》作文学批评则非常发达。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就屈骚多侧面地进行批评与论争，构成了现代《楚辞》批评史上的内容丰富、复杂多样、论争激烈、延续深广的特点。其中批评者的众多、研讨问题之广泛、著作之丰硕，超过了辛亥革命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可谓前无古人，叹为观止！

从浩瀚的现代《楚辞》批评著作中，清理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集中概括，进行综合性的论述，以期从中认识我国的《楚辞》学发展到现当代所具有的规律及其特征。这是一件至今尚无问津者的工作。这是笔者要撰写本书的原因之一。

前些日子，国外的汉学家在文章中曾涉及“现代《楚辞》学的起点”的问题。要回答这一点，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系统地研究和总结现代《楚辞》理论批评的历史规律，才能找到答案。为探索这一中外学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才甘心坐这“冷板凳”。这是笔者要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二。

鲁迅先生曾说：“多翻有比较，一识得真金。”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学的规律，是近几年文学研究领域的趋向之一。用这种方法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及现时人们注目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方法结合起来，将现代《楚辞》学上的理论批评进行综合整理，系统地对现、当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观点的《楚辞》批评者，进行别流派、评得失、明建树的论述，以辨明不同流派的不同观点的渊源及其关系，从而发现一些共同规律，为《楚辞》学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这是笔者要撰写本书的原因之三。

1987年，本书的前集——《屈原问题论争史稿》（是写从汉代至清代的有关屈原问题论争的历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于世之后，《文艺报》、《北京日报》、《鹤城晚报》、《重庆社会

科学》等报刊，曾有评论与介绍。在此书的《前言》中，曾预示现、当代部分将以“屈原问题论争史续稿”的命题进行写作。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所评述的论著，多以《楚辞》为研究对象，特别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徐耀明同志建议将现当代部分定名为《现代楚辞批评史》，以期从《楚辞》的理论研究的角度，展示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侧面，折射各个时期人们对《楚辞》这一文学传统的不同态度和观点，从中窥视它的可“与日月争光”的斑斓异彩，是怎样透过层层雾障，辉耀于世界文坛的。

自“五四”运动迄今，历时仅70余春。人世沧桑，学界风云，虽尚可按迹寻踪，然因各种原因，对于造论著作所需的资料，有的仍然很难寻找，所以搜集资料的工作，非常艰巨。笔者或钩沉于书海，或求教于长者，或访问于友人，尽量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务必实事求是，言由衷出，努力做到评鹭公允，褒贬适当；既不枉评古人，也不妄议存者。为此曾殚心而沥血，疾感于苦思；费时四载，增删五次，最后定稿于病榻之上。此道虽苦，然而承蒙各级领导机关的关怀，将此书列入“四川省‘七五’重点科研规划”，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垂青，列入正式出版计划，知道将来能出版发行于世，也足乐了。笔者自知才浅学贫，难免粗疏错陋，敬祈国内外专家与读者，随时垂教。故特书于卷首，以明笔者切盼之心而已。

作 者

1989年9月写于重庆师范学院

目 录

序	汤炳正	(1)
前言		(4)
第一章 “屈原否定论”提出者的主张		(1)
第一节 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 《楚辞讲义》的“天人之学”		(2)
第二节 胡适的《读楚辞》提出的屈原 为“箭垛式的人物”论		(15)
第三节 许笃仁的《楚辞识疑》的 “刘安作《离骚》”说		(25)
第二章 “屈原否定论”的追随者的 专著——《楚词研究》		(41)
第一节 何天行的《楚辞新考》		(42)
第二节 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 ——屈原与刘安》		(62)
第三节 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它》		(68)
第三章 著名文学史家的“屈原肯定论”的代表作		(81)
第一节 梁启超的《屈原研究》		(81)
第二节 谢无量的《楚辞新论》		(88)
第三节 陆侃如的《屈原评传》		(97)
第四节 游国恩的《楚辞概论》		(106)
第四章 著名作家的“屈原肯定论”的代表作		(114)
第一节 鲁迅的《屈原及宋玉》		(114)
第二节 茅盾论《楚辞》的神话特色		(122)

第三节	周而复的《屈原研究》·····	(129)
第四节	闻一多的《廖季平论〈离骚〉》·····	(134)
第五节	姚雪垠的《屈原的文学遗产》·····	(139)
第五章	郭沫若肯定与歌颂屈原的	
	学术论著——《屈原》·····	(151)
第一节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楚辞》	
	批评史上的卓越专家·····	(151)
第二节	对廖季平、胡适的“屈原	
	否定论”的批驳·····	(153)
第三节	肯定屈原是战国后期的历史人物·····	(159)
第四节	全面讨论屈骚，为屈原争著作权·····	(166)
第五节	郭沫若在屈原问题论争中的历史功绩·····	(170)
第六章	关于屈原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的矛盾问题的论争·····	(174)
第一节	侯外庐探讨“屈原思想的秘密”·····	(175)
第二节	郭沫若与侯外庐论争，探讨	
	“屈原的思想”·····	(195)
第三节	姚雪垠论屈原的矛盾·····	(207)
第七章	国统区文艺界关于屈原是否	
	“文学弄臣”的论争·····	(217)
第一节	论争的起因与发展概况·····	(217)
第二节	孙次舟的“屈原是文学弄臣”论·····	(221)
第三节	陈思苓写《屈原辨正》，“专	
	答‘文学弄臣’的主张者”·····	(236)
第四节	闻一多的《屈原问题——敬	
	质孙次舟先生》·····	(242)
第五节	刘开扬写《屈原论》与孙次舟、	
	闻一多进行商榷·····	(256)

第六节	郭沫若的两篇驳论, 反对视屈原为“文学弄臣”.....	(262)
第八章	全国解放后关于《楚辞》作者问题的再次论争.....	(268)
第一节	朱东润的“《楚辞》探故”全面否定屈原的著作权.....	(268)
第二节	郭沫若与朱东润争论屈原的著作权问题.....	(274)
第三节	沈知方论《楚辞》的作者.....	(280)
第九章	屈原是否为“法家诗人”的论争.....	(288)
第一节	靳南鼓吹《离骚》是“法家第一部划时代的文学作品”.....	(290)
第二节	屈原是“法家”, 还是“儒家”的论争.....	(297)
第三节	王祖猷、陆永品以“爱国诗人”论屈原.....	(306)
第四节	姜亮夫论屈原“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316)
第十章	中日学者关于屈原问题的论争.....	(322)
第一节	中日学者讨论屈原问题的 发展过程和概况.....	(322)
第二节	日本学者介绍与倡导“屈原否定论”的代表作.....	(327)
第三节	姜亮夫、汤炳正先生反驳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	(353)
第四节	黄中模的《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	(362)
第五节	中国其他学者与日本学者 讨论屈原问题的代表作.....	(373)
后 记		(389)

第一章 “屈原否定论”

提出者的主张

自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上，一方面是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介绍和取用。介绍西方文化，反对封建文化，固然有助于提倡科学与民主，然而它却导致了一次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

涤荡旧文化中的污泥浊水是应该的，然而倒洗澡水连婴儿一起抛弃的倾向却出现了。全盘西化与学术上的疑古之风，导致文化上的怀疑一切风气的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屈原问题的论争，就更加复杂化了。

在那眼花缭乱、波谲云诡的屈原问题的论争中，“屈原否定论”的提出，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屈原问题的论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屈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他的存在及其主要作品的著作权，在我国古代从未有人怀疑过。然而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之后，廖季平、胡适、许笃仁等人却对历史的铁案提出了怀疑。它们的基本观点是怀疑屈原的存在，否定屈原作过《离骚》、《九章》、《天问》等诗篇。这种观点，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教授称之为“屈原否定论”。①

否定屈原的主张，经廖季平、胡适等人相继提出，便在“五四”之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

时的学术刊物纷纷刊登这方面的讨论文章。著名文学史家、著名作家也积极撰写这方面论著，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的学术论争之一。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屈原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②，《离骚》等作品非屈原所作，论者就应该有真凭实据。然而若是一点真凭实据都没有，全系一些凿空之谈，那就无损于屈原的一根毫毛。

由于屈原距离我们的时代非常遥远，加之文献资料不足，因而《文艺报》社论曾指出：“关于屈原，我们还是认识得很不够的。”^③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先生曾希望人们不要感情用事，对于“屈原否定论”要“能够冷静地整理、研究”它。因此本章将对“屈原否定论”的提出者的著作和主张，加以叙述和评论，以便广大读者探赜索隐，评判是非。从而推动我们“认识屈原的真实价值”。^④

第一节 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 《楚辞讲义》的“天人之学”

在辛亥革命之后，首先怀疑屈原及其作品，成为“屈原否定论”的“嚆矢之作”的，是廖季平的《楚辞讲义》及其评骚论点。

廖季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是清末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他的老师王闿运也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师，曾著有《楚辞释》十一卷。廖氏治今文经学，在光绪六年，二十九岁之后，弃训诂文字考据之学，厌其破碎，专求大义。所谓“求大义”，指治《公羊春秋》，后来发展为尊今(文)抑古(文)，这时廖氏受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曾著《知圣篇》与《辟刘篇》^⑤，主张六经为孔子自作，认为刘歆作假，颠倒五经，伪造古书，遗误后人。从而宣传进化观点。他在《知圣篇》中云：

由开辟以至今日，由今日以至千秋万岁，初蛮夷而继文明，日新不已，臻至美善。今之文明，远过古人，后来又必远过今日，一定之例也。

这种维新与进化观点，给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以很大影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及《新学伪经考》，就是在廖氏的影响下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

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平，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知守今文家法，晚年以张之洞故，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法，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⑥

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说：“廖季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诞。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⑦这两段话说明廖季平所治之学，曾对康有为的变法，有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在戊戌变法之后，廖氏思想的变化。

廖氏的学术思想，一生经历了多次变化。他自称于治学之始是“癸未今古”（即1883年，其时廖氏32岁，治今〔文〕古〔文〕之学）；其后是“戊子尊今抑古”（1888年，廖氏三十七岁），继而是“戊戌小大”（1898年，廖氏四十七岁，即放弃了“尊今抑古”，变为只称“小大”了。所谓“小大”，是把经学中的今文、古文，以“小大”称之，如他说的：“《春秋》小、《尚书》大”，“《诗》小、《易》大。”⑧）再过几年，则变为“壬寅天人”（1902年，廖氏五十一岁，对经学又加上“天学”与“人学”）。这就是他说的“经学四变”⑨。及到戊午（1918年，廖氏68岁），又变为专就《六经》分天人大小，则谓之“经学五变”。⑩

廖氏治经学，经历了这些变化，对他的学术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现在他对于《楚辞》的研究中。

廖氏对于《楚辞》的研究，贯穿在他的许多著作中，论述的片断较多。然而能够集中体现他的观点的，还是他的《楚辞新解》和《楚辞讲义》。

他的《楚辞新解》一书，社会上不易见到。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评论廖季平的观点时说：“廖先生的《楚词新解》我还没有看见过，他的详细的论证，我自然无从知道。”他评论廖氏之说，是据谢无量的《楚辞新论》的转述。近期在我国发表的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先生的文章亦云：

而否定屈原本身的存在，则似乎始于廖季平。

廖季平作学问一生多变，见解离奇，是众人皆知的。他的大部分著述均收入《六译馆丛书》（民国十年，四川存古书局刊）。其中关于《楚辞》的著述有《楚辞讲义》、《高唐赋新解》、《离骚释例（附楚辞跋）》，唯独不见熟悉的《楚辞新解》这一倡导“否定论”的嚆矢之作。现在看来，只有以谢无量《楚辞新论》的引文作为根据了。^⑪

稻畑耕一郎先生根据谢无量的“一段记述”，概括介绍了廖季平否定屈原实际存在的论据有三点：

其一，《史记》中屈原传记的记述不真确；其二，《楚辞》是“天学”，《诗经》的旁系；其三，《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秦始皇自序，其他屈原作品大多出于秦博士之手。

这些主张可由《六译馆丛书·楚辞讲义》中大体得到印证。

这些论述，对于廖季平评论《楚辞》的观点，大体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中外学者没有看到《楚辞新解》，而谢无量的记述又比较含混，更不太符合《楚辞新解》的内容，因而把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之间的发展抹煞了。

笔者最近查到了《楚辞新解》一书。此书虽然也属于《六译馆丛书》，但它与别的此类丛书不同。^⑫此书在扉页前面有“萧燾署”题的“《楚辞新解》一卷”，背面有“甲戌季秋开雕并研廖氏藏版”字样。书前有作者的“叙”，和“凡例”。正文开始是对《九歌》的注释。“叙”中注明写作时间是“光绪丙午四月望日”，又说：“时年五十四也。”可见这是廖季平在“经学四变”时的著作。

综合《楚辞新解》的内容大致有如下几点：

(1) 《楚辞》的作者问题 廖氏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惟有屈原明文者，乃为其自撰”，如“《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二是“为屈子所传”者。书的序言，开宗明义就说：“《离骚》者，子屈子之所传也。”廖氏把《卜居》、《渔父》之外的屈赋皆称为《离骚》。他说：“《离骚》旧本下有经，大约《离骚》为经正文，以下各篇皆为传记。”如《九章》、《九歌》、《远游》、《招魂》等皆是。

(2) 《楚辞》的内容问题 在此书的《凡例》中，首先就说明：“《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廖氏据此进行阐述，大约有以下内容：

①廖氏申言：“近乃由《楚辞》得明天人之分。”所谓“天人”，即“天学”与“人学”。他说：

人学专言六合以内，天学则在本世界以外。在上为天神，在下为地祇，居四方者为人鬼。

天人之学自顓頊而分。《楚辞》首言高阳明其本，为帝之人学，由高阳上推，所以为天学。

这是此书论述问题的出发点。在廖季平看来，凡“不在本地球”之事，皆为“天学”，而《楚辞》所言，正是如此，故说“由《楚辞》得明天人之分”。

②廖氏认为：“《诗经》为天学，非本世界之事”，而“《诗》为孔子思志，一人在下，即指孔子而言。”

③《楚辞》全本于《诗》，《楚辞》周游全为神游梦想，皆“出于

《诗》”，“编《楚辞》释例多与《诗》例相同”。《楚辞》是“为《诗》作传”。所以“《楚辞》为孔子天学”。

④关于《楚辞》的宗旨，廖氏认为，既然是“天学”，与“道家别为一派”，因此是宣传道家学说。他认为自从司马迁“误以所传为自作，指为离忧沉渊而死，后来承误《楚辞》遂为志士失意发愤之代表”，这种“所传屈子一身一家之私事，与经传不相干”，他说：

纵有悲愤沉渊事，与师傅授受之传记则不相干，不能因其私事，附会古之传记。

从此可见廖季平不相信《史记·屈原传》。他在此时还未全盘否定屈原，而只是说此传与屈子之私事不相干。同时对屈原悲愤沉渊，也未完全否定。只是认为它与《楚辞》内容不相干而已。

⑤班固讥刺屈原“露才扬己，忿恚自沉”，甚至认为屈原在“丑诋君父”，廖季平也认为是不对的。他说：

按《楚辞》经营四荒，周游六漠，揖让五帝，造向太微，乘云御风，驾龙馭螭，且愉娱以自乐，超无为以至清。乃至高之□，亦至乐之境界，以为穷愁，失其旨矣！

这是说《楚辞》反映的内容，是在“至困之中有至乐”，如《远游》是说“天人平等，快乐详矣”。因此不能解《离骚》为“离忧”。然而应该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离骚》篇名不可解”。

综上所述，廖季平把《楚辞》分为“屈子自作”与“屈子所传”两个部分，“别为新解，以明天学”，就是他的《楚辞新解》的主要内容。

由此可见谢无量在《楚辞新论》中认为廖氏的《楚辞新解》是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秦始皇自序；其他屈原作品大多出于秦博士之手”等语，均不符合《楚辞新解》的实际内容。而此书也不能算作是“屈原否定论”的“嚆矢之作”，只不过是對屈原的作品提出一些怀疑，对《楚辞》的解释